

我们说的是什么样的“殖民地影响”？

让-弗朗索瓦·贝亚，罗曼·贝尔特朗

在原来的殖民大国与原来的殖民地国的关系当中，历史的影子经常会出现。津巴布韦和英国之间，或者科特迪瓦和法国之间都发生过外交危机，巴黎和阿尔及尔就殖民问题有过争论，卡扎菲上校援引意大利在殖民战争中的残暴行为，让意大利为从的里波黎到班加西的高速公路投资，以及很多其它的类似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日本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殖民大国，所以也不例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以及从十九世纪末以来的领土扩张政策，仍然危害到日本与韩国和中国的关系。在玻利维亚，埃沃·莫拉莱斯在石油业国有化的过程中，指责西班牙的企业莱普苏尔公司（Repsol），同时谴责说，有人“五百年来便在掠夺自然资源”。

然而，问题不仅仅是那些狡猾而无耻的政府把历史的记忆当成政治和外交的工具，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2005年所谓“自发的”反日游行曾让人觉得可笑，或者科特迪瓦的巴博总统及其政府根据形势的变化，挑起并操纵年轻爱国者的民族情绪，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在所有的情势之下，人们对外国占领的回忆都具有潜在的作用，能够挑起人们的激情，我们不能只简单地看到有人从战术上利用了这种激情，而且对于民族的领导人来说，这些激情常常具有限制的作用。比如“慰安妇”的问题最近一些年在南韩常常激起民愤，所以时常使守尔的外交处于窘境。在非洲，有很多事都证明，人们对公共发展援助和移民问题的看法总是与殖民主义的过去联系在一起。

比如马里卡伊地区卡巴戴（Kabaté, dans la région de Kayes）的一个年轻人便说：“到法国去，这也是一种挑战，是我们和法国之间的一场斗争。即使你们修一道柏林墙，我们也会跨过去。我们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我们应当到法国去。”

有争议的歌手阿尔法·布隆迪（Alpha Blondy）从1985年便说：

“我们是一个西方制造的，使人感到头痛的文化熔炉，我们是居无定所的人。他们来了，并对我们说：我们要把你们变成殖民地。扔掉你们的遮羞布和当衣服穿的树叶子吧。穿上涤纶衣服，穿上牛仔裤，戴上太阳镜。可是走到半道上，他们又改变主意了。‘你们听着，这样做代价太高了，你们现在独立了！’这样说也太轻巧了吧！我们不要这样的独立。我们之间的合作开始得很好，我们愿意让这合作继续下去。你知道，你必须承认我，你不能说我是杂种。我是你的文化的产物。我现在是由你产生的[……]白人不能说不管就不管了。征服了我的人，把他的语言给了我的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我不能再让他犯错误。”

帝冈·雅·法高利（Tiken Jah Fakoly）则在歌中唱道：

“废除了奴隶制
他们又发明了殖民地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时，
他们又发明了合作
有人谴责这种情况时，
他们又发明了世界化
是巴比伦在剥削我们。”

对殖民和奴役的回忆会使人产生一些文化上的想象，某些巫术的形式，比如艾恐（*ekong*），对玛米·瓦达的崇拜（*culte de la Mami Wata*），或者城市青年的雷凯音乐幻象（*fantasmagorie reggae*）都是人们知道的非洲的例子。在各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当中，这也是人们拿来说事的一些题目，比如民兵或者武装运动征兵，甚至一些恐怖主义活动也包括在内。从这个角度看，人口虽然代代更替，但殖民遗留问题在人们的政治意识当中仍然象当初一样尖锐。人类学家和电影制片人艾利亚那·德·拉杜（*Éliane de Latour*）曾多次著文，并拍摄了电影《布隆克斯-巴贝斯》（*Bronx-Barbès*）（2000年）和《天上的鸟》（2006年）（*Les oiseaux du ciel*），分析了巴博总统的青年爱国者，或者科特迪瓦的贫民区里的居民，说这些人仍然根据殖民化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战略，虽然有的人也提到当代一些重大的关键问题，比如公民权，就业，土地，金钱，女人，文化的普遍性或者迁移的机会。“殖民地的过去”这个词现在十分盛行，但值得我们澄清，不过我们可以暂且保留这个词。挥之不去的殖民地的过去问题，在大部分曾在历史上与殖民帝国有关系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尖锐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的关键问题。

在原来的宗主国就是这样，公共舆论和政治阶层都认为，政府的发展援助和“移民”问题，“伊斯兰问题”，“非洲”或者“亚洲”问题，都是与旧时留下的帝国意识分不开的，但又不能简单地看成只是帝国意识的影响。法国目前对郊区和“共和国土著”的激烈讨论，就证明了这一点。从意识形态的争论到法律提案，在原来的殖民地独立之后四十年，殖民化问题再一次成为公共舆论发生分歧的主题，其原因也许只不过是在民族意识的形成当中，在十九世纪以来，甚至是十六世纪以来，在欧洲民族主义得到确认的过程中，这一问题起到了结构性的作用。艾田·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在谈到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时，指出过这一点；他认为，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是一个整体，也是“一个与半个”的关系：

“应当提出置疑的，是人们认为民族归属的意义必然是通过整数来表示的，比如一定是一或者二[……]一个民族是在帝国当中形成的，意思就是说，帝国永远在，而且仍然在所有的民族当中[……]。”

因此，这是一个在痛苦的回忆支配下的时代：因想到屠杀、强迫劳动、奴役而后悔的时代，是缺憾，或者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愤怒的时代，但是也是人们怀念“美好的过去”的时代，怀念欧洲在海外起积极作用的时代。在英语国家，社会科学有一股批评的潮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些文化的研究（*cultural studies*），领头人物主要是霍米·巴巴（*Homi Bhabha*），保尔·吉尔鲁瓦（*Paul Gilroy*），斯图瓦特·霍尔（*Stuart Hall*）和盖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这一新的潮流认为，殖民状态必然存在于当代的政治经验当中，尤其存在于阶级或者性别压迫当中，存在于移民的社会条件当中，存在于掩盖各种历史背景，认为具有广义的与殖民地有联系的事物只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性质，把殖民地所遗留下来的思想，物化成基本的“后殖民”思想所带来的风险。

不言而喻的是，原来的殖民地也有它们对“帝国的回忆”。对于非洲、亚洲或者拉丁美洲的统治阶级以及与他们争夺权力的阶层来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感情显然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源泉。从殖民国家及其政治经济关系当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仍然潜在地存在于一些重要的社会隔阂或者冲突当中，因为从帝国时代继承来的统治、积累和排斥方针仍然起作用。“殖民地的影响”作为意识上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我们要超越那些老生常谈的论调和虚假的解释，必须真正地理解这一影响的意义。

殖民影响：不容置疑的事实和半真理

首先，我们列举一下，在人们的感受或者假设当中，都有哪些思想是从殖民时期一直延续到“后殖民”时代的，这也许不无益处。我们不一定列举出全部，也不一定奢望解释这些表现，或者赋予这些表现一些解释性的功能，我们也不一定能够详细地说明每种表现的形式。

谈到最突出的殖民影响，我们不能不想到，由于移殖民占领和管理，以及殖民大国相互之间的作用而产生的国家的政治领土仍然存在。的确，以回顾的眼光来看，去殖民化从一般的意义来说，是以各种不同程度的冲突形式，来争夺殖民国家的政治空间，在非洲和亚洲莫不如此，只是印度次大陆是个例外。印度次大陆是1947年被强行分割开来的。1991年之后，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也是个例外。领土范围的再现不仅仅是政治精英屈服于“帝国主义”，在独立的时候背叛的结果。而是以复杂的，大量的社会实践和逻辑为基础的。当代国家实际文化和象征文化是国家合法化的重要因素，比如在建筑，城市规划，服装，厨艺等领域。这种文化也起源于殖民时代。另外，大部分个别的特征，有时候被人称之为“首要的”，是很能欺骗人的，比如非洲的人种问题，印度的族群问题或者黎巴嫩的教派问题，在殖民时代从事实上变得列为突出，不能说这是一种在文化上的返祖现象。这曾经是夺取后殖民国家政体的其它模式。同样，某些“全球的”人种激进主义，比如美国或者非洲撒哈拉地区的非洲中心主义，以及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就有的阿拉伯国家的反犹太主义，似乎部分地产生于十九世纪欧洲的种族主义，以及把人划分成欧洲人、犹太人、土著人的殖民地社团思想，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

因此，掌握着当代经济和国家的阶级或者群体经常借助殖民国家的阴影，有时甚至借助于他们与殖民国家的优先关系，强调自己的优势。我们不能把原来的殖民化情况普遍化，认为整体上都是这样，也不能把问题绝对化。然而，当代不平等和压迫体制源起于殖民时期，好象是不可辩驳的事实，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帝国主义的因素，但这并不能排除真正发生突变的可能，有时候还是革命性的变化。在政府的意识当中，很多想法也来自于殖民时期。首先是“发展”这个典型的概念。通过这个概念重新提出的，是所谓的“开发”和“教化的使命”的问题，也是传教士的事业，至少从其普救说的感情上来说是这样，比如伦敦传教士协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或者南部非洲的卫理公会所代表的就是这种感情。民族主义运动的推动者和后殖民国家的管理者们承认主宰自己的大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也是在殖民时期传播开的，传播的方式可以是在帝国的中小学和大学通过直接教育，也可以通过社会的毛细管现象，通过殖民化的第三方作用，比如共产党、社会党的社会斗争，甚至基督教的社会活动，通过各帝国之间的团结和社会化网络，通过大学生在宗主国的学习，通过殖民地的人在西方世界，包括社会主义阵营或者其它的帝国属地的各种经历。另外，改革派作为一种政体思想（也包括新自由派的思想）和公共政治的模式，在殖民政体当中也有先例，殖民政体本身就是不断地“改革”的，同时又想改革他所征服的社会。

但是，除了这些明显的“政府治理”或者“政府管理”之外，殖民政体内部社会现象的象征意义作为政体的出现及其效率的条件，在国家独立之后，又一次大行其道。进步的积极观念，以直线性的和目的论的方式穿过历史，从传统的根基一直到现代性的基础，这种普罗米修斯窃来天火救人，使政府管理人，工程师，医生“掌握”大自然，疾病，掌握人和事物的观念，从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于殖民时代，都是产生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因为殖民时代只是一种变化观念的模式而已，而这种变化观感与启蒙时代，与启蒙时代“开明的专

制”和“*Policeystaat*”，与福音传道的事业，与工业和技术革命，与圣西门的学说，与共济会的思想，与民主和共和的思想，与种族的理论，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分不开的。

然而，帝国的“认识体系”不能归结成殖民地的宗主国把其“现代性”强加给土著的“传统”这一种意义。事实上，事情总是更为复杂的，哪怕是因为两个多世纪以来，“传统的发明”在帝国的宗主国和殖民地都是社会变化的主要推动力。虽然艾里克·霍布斯巴姆（Eric Hobsbawm）和特伦斯·兰吉（Terence Ranger）对“传统的发明”这个词过于系统和机械的用法有些警觉了，但是，这个词的概念还是有益地反映出民族主义各种意识形态或政体倾向观念，而且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也反映出城市文明及其大众消费的观念，也包括大众消费对“新”和“真”的崇拜。同时，这一概念也指一些间接规则的主要机制，以及同时出现的作为他者，因此也就是自我的东方学。从这种意义上说，“传统的发明”是十八世纪末以来作为国家民族和世界化形成的一个基本因素。今天，这一概念仍然是主要的概念。文化主义——所谓文化主义，也就是从内心深处相信文化是以单独和完全的方式，甚至是以对立的方式存在，而且我们都属于各自不同的文化——是世界化令人难以理解的一种空想。两个世纪以来，经济规模、金融、社会、政治或者认识的变化与身份退缩的过程以及各种各样的个别性及其产生是并驾齐驱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关于“文明冲撞”的论断并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却很时髦，大学里也出了一些新的学科，称为人种发展和人种心理学，也很时髦，但这些概念只是在新的形势下表现了这一总的趋势。虽然未必有联系，但这一论断所回应的，是对人们对英国殖民人类学的关注，尤其对马利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作品的关注。马利诺夫斯基当然是优先注意“接触境况”（*contact situation*）的，认为白人与土著人的合作开启了社会的变革之路，但他也谈到过“种族之间的冲突”，或者“文明之间的冲突”，提出了一些“分而不能合”的现象之间的互相对立。

我们也可以认为，“公民社会”在当代的激情再一次成了“发明传统”的基础，并成为一种“间接规则的新形式，土著文化因此而再一次被动员起来，以控制土著人”，比如在小额贷款，小型企业创业或者在环境保护等等领域。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提出的向市场经济和民主“过渡”的问题，使一些非政府组织成了人们喜欢的附属机构，但这些问题符合从前以发展或者现代化为借口的专制主义的前题。今天与昨天一样，进步的敌人，是人民自己，是人民的传统，人民的愚昧和自私。需要跨越的障碍，是现实的社会，虽然人们在颂扬社会的本质，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公民社会”，但从前的说法是“民族或者无产阶级”。新自由派的“休克疗法”是与“社会外科手术”并驾齐驱的。用1940年代一个历史学家的话说，“社会外科手术”的观念是“殖民问题”所特有的。经过过去二十年所谓的自由化改革之后，在建设市场机制的同时，也可以出现一些政治和社会的控制机制。在自由化改革中所推进的众所周知的公私合作，是系统的殖民合作的翻板。所谓的殖民合作，是政府为作一方，投资人，企业，买办，基督教传教团或者土著的中间人为另一方，以授权、转让、组建普通农场的形式进行的合作。这都是“国家私有化”的过程，在当时非常有利于使掌握权力的人和积累资本的人统一立场，而且也与“间接规则”的实践是一样的。

经过简单的分析，以上几点便说明了殖民影响的规模。对于上述简单的分析，我们还可以补充几点意见。对于殖民地国家来说，有时候殖民化是“在彻底失败之后所陷入的一种麻木状态”，或者是从意识形态上这样重构的。在某些情况之下，其暴力的程度是不能低估的：对赤道非洲“残暴征服”持续了四十年，从1880年到1920年，导致当地半数的居民死亡。另外，各殖民帝国逐渐都建立了种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在南部非洲慢慢累积起来，导致政治关系和社会生产关系中出现针对肤色的强制性规定，也出现了同样是十分残酷的象征性奴役。从这

一角度来看，殖民化所代表的，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米歇尔·沃维尔（Michel Vovelle）所说的“创伤事件”（événement traumatisme），而且在被征服的社会和征服者的社会上产生的历史影响越来越深刻。殖民社会作为从政治上顺从于别人，从军事上被别人占领的社会，发展了一系列以狡猾、掩饰和嘲讽为主的行动方式。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殖民社会所特有的，因为在东欧国家或者意大利也时有所见，而且与土著文化的“梅迪斯”（*mètis*）或者欺骗手法联系在一起。非洲联盟党的一位负责人于1959年说：“殖民行为自然而然地能够导致一种地下行为的精神反映”，今天，投资人所提出的条件统统被人想方设法地回避，这也许是这种历史经验的继续。同样，殖民形势或者殖民时期普遍采用的经过中间人协调的原则也增加了当局、附属人员或者殖民地属民之间“在具体操作上发生误会”的机会，并使这种相互之间的作用方式成为惯例，一直延续到今天。殖民社会（以及后殖民社会）因此而成了“双层底”的社会。这些社会是由多样性的时空组成的，具有深刻意义上的相异性，要想使它变成统一的实体，并不容易，不管是从“合作”、“民族斗争”、“民族融合”、“参与”的意义上说，还是从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方面来看，都不容易成为具有一致性的社会。而且我们只是提出了在这些社会上所出现的一些大的观念。

因此，殖民国家对所征服的社会的控制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制，但其效果却是实实在在的，持久的。在这一点上，“西化”并不是一个适宜的概念。非洲和亚洲依附于西方国家的规模在很长时间里是被夸大了的。事实上，殖民化并没有消蚀殖民社会顽强的历史性，只不过改变了社会外向性的条件。极而言之，殖民化为殖民社会提供了一种“因依附于别人而得到的年金”，社会的各种行为者通过社会斗争，甚至通过与公共政治和殖民战略无关的武装斗争，竭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夺好处。殖民化改变了社会竞争的规模，建立资本主义，或者使资本主义变得神圣的学说，因此也就是在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上建立了私有财产的体制和司法实践，传播新的知识，只把国家-民族当作是一个政治冲突的主要舞台，把有关的国家领域纳入新的世界网络当中。

继承

在目前的社会科学论争当中，一切只从历史的角度或者只从文化的角度，单纯从因果关系上的解释都是不合时宜的。比如，没有任何人关注英国和法国的殖民管理模式分别在非洲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因为这种两分法的基础似乎是一种不充分的经验性分析，更多地促使了民族动乱，却与事实不符。法国的殖民管理从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的”，而且“殖民规则”也从很大程度上具有统治经济论的特点。同样，认为殖民“政治文化”，或者，出于一种不恰当的对比而提出来的所谓“传统”的政治文化的思想是当代社会行动的决定因素，这样的思想实际上经不住人们的仔细考察。在一定的形势之下，不同的行为者，有的时候相同的行为者在不同的时候，都会从相同的过去得出相反的教训。而且最近有人经过研究，将维希政府和“浩劫”的特别立法的主使者和责任，归咎于殖民征服和殖民国家的特别实践；这种研究采用的是目的论的方式，研究者带有个人的情绪，年代上也有错误，所以是曲解。这也是从相同的过去，得出不同结论的一个例子。有时候“后殖民研究”本身也会流于这种文字上或者论争上的简化，认为殖民经验是当代世界所固有的经验。我们并不是说这一假设从本质上就是错的，但是具体情况需要具体的证明，而不能只从形而上的方式，作为实质性的东西和假设提出来。

“殖民遗产”和殖民地社会的遗产都不能够成为自足的解释因素。恰当的研究方法显

然是政治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使社会发生变化，同时又表明了社会发展主线的明确划定的形势当中，审视具体的过程。

对当代国家治理中“殖民的遗产”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相反，从各种不同程度上具有连贯性的一个问题是，当代的国家治理方式肯定与作为其前身的殖民的过去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在每种形势之下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不能建立一种总体上的“殖民遗产”理论或者解释，而是只能确定一种在确定的背景之下可以使用的分析方法，比如针对某个发展项目或者计划，或者针对某个历史地域，某座城市，某个国家或者地区，根据某种适合于我们所寻求的《规模组合》进行分析的方法。

在这一点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作品可以给我们帮个大忙。马克斯·韦伯在所做的因果分析当中，强调了“共时性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s synchroniques），但也强调“历时性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s diachroniques），他把历时性的相互作用定义为“遗产”，或者“先前的条件”。他没有划定数量有限的因素，更没有说是出于一种因素，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一般原因。在他看来，一切因果分析都应当十分注重“行动方向的多样性”。马克斯·韦伯从历史的经验上进行思考，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采用历史模式来思考的：“从历史现象中形成的概念[……]不会把[……]现实纳入抽象的范畴当中，而是竭力把这些概念与具体的一般关系联系起来，而具体的一般关系必然会有其个别性的特点。”然而，一般的规则是，“从过去继承来的东西到处都会变成在现实中被认为是有效的事物的即时前兆。”现实与过去的这种关系是不完全的，潜在的，发展的，长期性的，总而言之是具有偶然性的。这是属于背景性的东西，而且从这种意义上说，如果因果关系假设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那么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很危险的。因为，因果关系的因素只在一定历史情况的个别结构当中才是有效的。由过去而确定了结构的行动，也在参与着现实当中的相互作用。

由此看来，“殖民遗产”的问题变成了由殖民的过去所确定结构的背景问题。而“前一个时代的影响”模式可以被人轻而易举地改变，是自相矛盾的，而不是具有单一性的“因果链”。因此，“遗产”可以在同一个范畴之内——比如在宗教和政治领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再次产生，也可以从一个范畴转移向另一个范畴，比如从宗教或者亲族关系领域，转移到政治和经济事物当中。奥利维埃·鲁瓦和皮特·盖斯谢（Olivier Roy et Peter Geschiere）曾指出，在中亚和喀麦隆南部，亲族关系是如何表现为市场经济的一些因素的。另外我们知道，政治关系及其合法化在传统上正是借这些因素得以表达的。正是从一个范畴向另一个范畴的转移，说明了为什么“遗产”和“先前的条件”从来不能通过其本身建立起恰当的因果关系。

因此，问题不是以静态的方式估计“殖民遗产”对“治理”或者“政府管理”的当代形式的影响有多大，而是要恢复这些“治理”或者“政府管理”从殖民过去当中出现的过程，所谓“出现”，就是指米歇尔·福科所说的一些社会实践或者现象在历史偶然性的缝隙当中“出现”（*Entstehung*）或者“产生”（*Herkunft*）的过程，而且最好是这些实践和现象线性的原始点（*Ursprung*）。我们想到好几种一致的说法：

- 殖民遗产继承的历史行为者社会学：比如以研究在海外任职的政府管理人员或者警察，并且在非殖民化时期又回到宗主国行政机构的人为主的社会学。

- 政府的殖民模式与后殖民国家的联系研究，旧有的形式与当代的模式交织在一起，当代的模式使旧有的形式归附于自己，或者相反，被旧有的形式所颠覆。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中采用了这种分析，或者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然后再从封建制到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上来研究，比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或者从生产模式以及家族社会生产服从关系的模式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上来研究，比如克洛德·梅亚苏

（Claude Meillassoux），埃玛努埃尔·戴莱（Emmanuel Terray），皮埃尔-菲利普·莱（Pierre-Philippe Rey）等等。历史学家们还阐明，印度次大陆的商品网络是如何在大英殖民帝国内部和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的。这些商品网络一开始是与传统的市场隔绝了的。同样，在殖民时代形成的社会关系，殖民时代建立的劳动力剥削模式以及经济机构管理模式，以及当时的商品流通模式，都可以在当代世界的治理中再次出现。尽管如此，这意思并不是说再次出现的形式与殖民帝国时代是一样的。

- 托克维尔关于“旧制度”和“革命”的问题，新制度通过不一样的手段所追求的是与先前的制度同样的目的。比如一些国家独立的中断，土耳其共和的破裂，中国和伊朗的革命。这种方法在研究当代国家的公共政策方面尤其有益。

- 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格拉姆西问题，“被动革命”和“变化说”的问题，可以使社会统治集团“改变一切，以便让一切都一样”——这是唐克来德（*Tancrède*）在托马齐·迪·兰佩杜萨（*Tomasi di Lampedusa*）的《猎豹》（*Le Guépard*）中所说的原话——，同时从意识形态上和物质上选择从潜在的意义上激进的反精英人物。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统治阶级是如何在殖民占领时期，民族主义动员时期，非殖民化时期始终保持其影响力，并象尼日利亚北部的富拉尼和奥萨贵族一样，经历了种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变化而仍能生存下去。或者相反，如何象桑给巴尔的阿拉伯精英或者卢旺达的图西族一样，在国家获得独立的时候，未能生存下去。从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说，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能够很好地阐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后殖民国家的变化轨迹，以及“热月形势”的原因，一些革命阶层正是借助于这种形势，才作为为国家服务的专业政治阶级留存了下来，“热月形势”巩固了他们的统治，他们利用所有的渠道进行原始积累，今天不得不面对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规模变化这种双生的挑战（俄国，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伊朗）。根据每种不同的情况，在分解“无变化改革”的结构时，这种方法很有好处。所谓“无变化改革”是列入经济自由化的计划当中的，只要统治路线保持了连续性，从利益上是对历久而稳定的权力核心有利的（摩洛哥，突尼斯，叙利亚，肯尼亚，喀麦隆）。

- 封闭和排斥的累积效果时间长了，以负面的方式定义了“政治的恰当问题”（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同时也定义了一种不可想象的，或者无法描述的，或者不可能的政治。土耳其的共和国，伊朗的革命，突尼斯的改革，摩洛哥的苏丹政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民族统一，以及马来西亚的安全已经成为故事，并因此而划定了政治范畴，并确定了政治范畴的结构。我们还要知道这种状况是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普通关系”（马克斯·韦伯），从殖民或者类殖民事件当中产生的。

- 假设可以从时间上更新作为殖民帝国基础的霸权相互作用的第三方语言。我们已经看到了，“世界治理”的幻想有着或大或小的作用，“白人的负担”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表达方式，可是这两者之间有着多么大的相似性啊。不过，要认识这种相似性，一方面要对话语进行系统的批判分析，另一方面，认为殖民霸权会赖以重现的历史主义目的论是一个陷阱，如果想避免落入这一陷阱，就要与有关的形势或者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

1960年7月4日，利奥波德维尔的政府军总司令让森元帅（*le général Janssens*）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独立后=独立前”，从而引发了人们的愤慨。但这句话当时没有，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恰当的证明。

殖民时代：争论，典型，时代和组合规则

殖民国家是一个时期。首先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的一个时期，因为在不久之前，这一概念会让人觉得是正话反说，甚至是政治挑衅。关注殖民社会变化的作者在很长时间内使用“殖民形势”（*situation coloniale*）一词，代价是使“形势”（*situation*）一词变得僵化了，使这个词成为理想-普遍类型，成为“总体上的社会现象”，虽然在背景上使它有一席之地的必要性已经清楚地提出。“印度的次要研究”（*subaltern studies*）首先与这种方法决裂，假设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曾经在思想和行动上有过一个“印度自主的范畴”（拉纳吉·古哈/Ranajit Guha），不能把这一范畴简单地按照东方学者的那些说法，看成是不受殖民国家控制的。虽然这种研究的方法带有民族主义的民粹思想，理论或者方法上也不是没有疑点。后来又出现了一系列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作品，这些作品注重强调殖民国家与殖民社会的相互作用，甚至是“对话”或者“相会”，虽然需要批评“次要研究”的方法，使这一方法细化。现在这种“次要研究”已经分成几种潮流。

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殖民国家的概念是不合适的，那些没有经过非殖民化便独立了国家除外，比如拉丁美洲十九世纪初“单方声明独立”的罗德西亚，甚至于以色列某些蔑视犹太复国主义的人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有了殖民者和殖民地社会的行为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概念，我们可以排除这种反对意见。在合理合法的国家“建设”和“形成”的过程中，这种相互的作用都起到了潜在的作用，虽然国家的主权只是第二个阶段才得以建立（或者恢复）的。另外，殖民地宗主国的统治是与国家形成的内在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宗主国的统治并没有把这一过程完全消除掉，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重新进行了组合，进行了放大，或者为其建立了更加稳固的基础，有时候甚至是从中分裂出来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学认为，殖民统治对土著国家的萌发、成熟或者现代化起到了退化的作用，虽然不可否认的是，殖民统治把持了土著国家的主权，改变了土著国家的领土范围，打乱了其政治经济学，彻底改变了其社会基础。但是这种看法具有限制性，过于简单化。权力和被征服的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生产关系在殖民时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管殖民时期对这一过程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和阻挠。

殖民国家——更加准确地说是殖民国家的形成过程——的存在是个事实，这个殖民国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有特别的社会基础，而且有其特别的历史性，殖民社会并没有彻底地消除被征服的社会的历史性。这些观念现在是人们能够较好地认识的了。而且事实上，在社会科学上作为一个时代来看待的殖民国家，是一个处在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前和之后，都有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

首先，殖民国家应区别于其它的帝国或者殖民形式，虽然殖民国家与其它的帝国或殖民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混为一谈，可以交叉在一起，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其次，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殖民国家曾经历过不同的时期，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来看待它。其中的一个典型的历史可以回溯到威尼斯在克里特岛移殖民（1211年-1669年）。尽管距离遥远，威尼斯帝国还需要直接管理克里特岛，并没有把管理的责任交给征服的贵族，商业行会或者有特许状的公司。威尼斯内部也受这一海外经验的影响，希腊和拉丁人之间也因此而有了种族上的关系。重商的殖民帝国，尤其是天主教专制政体所代表的，是跨大西洋的官僚化的另一个阶段。另外，种植园的商品经济是后来拉丁美洲土著部族酋长和军事独裁者在国家-民族和资本主义合理-合法企业的框架之内进行统治的先驱形式。

但是，一开始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的，是现代最初的帝国，是持有特许证的公司，是商行经济。而取代了这些的，当然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殖民帝国主义。殖民国家在这时有了一种新的特点。殖民国家所赖以建立的直接军事占领，一方面是与国家民族的出现，与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扩张以及相伴而来的技术变革分不开，另一方面也与十九世纪后半叶欧

洲人和土著之间在社会关系上越来越严重的种族划分分不开。殖民征服也与其它的不一定相符合的发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比如资产阶级的，而且从潜在的意义上说带有批判意义的公民社会的结构。领导了福音传教活动的组织，是相对独立于国家，而且在废除奴隶制的信念支持之下，从很大程度上以协会的形式组织的传教团，而不仅仅是天主教会和一些与帝国权力和教廷共生的教会。除此之外，知识分子，新闻界和大学对帝国行使监督权，可以使帝国变得合法化，也可以颠覆帝国。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殖民国家的理想典型应该是有时代特征的，是有区别的，乔治·巴朗迪耶一开始便承认了这一点。按照最初的分析——但只能是按照最初的分析——，殖民国家经过了好几个意识形态的阶段，而这些阶段都影响到殖民国家的实践，公共政策及其政治经济，同时也影响到社会基础：大致来说，这些阶段有，征服阶段，“伦理”或者“文明”殖民化阶段，在1929年的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二次占领”阶段，政治自由化的阶段，最后是非殖民化的阶段。各个殖民帝国之间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同一个殖民帝国内部各个属地之间也不一样，甚至在同一属地内部，各个地区也不一样。殖民帝国的瓦解，不管是通过单边的撤退还是通过谈判，或者是由于另一个大国的征服而失掉的领土，由于在解放战争中政治或者军事的失败，都导致产生了不同的帝国意识，而且这些意识从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是平静的，不幸的，或者是带有怀旧情绪的。最后，我们还应当指出，殖民化的行为者——政府管理人，传教士，种植园主，工业家，商人，教师，医生，文人，等等，而且所有的人国籍不同，地区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出身也不同，他们之间也划分成了不同的群体，正如去殖民化的冲突所揭示的那样。殖民地的人在殖民国家内部或者相对于殖民国家来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殖民经验反过来也影响了宗主国。

因此，殖民化的确是一段历时和共时相互作用的历史，从十九世纪开始形成的全球化是这种“普遍化的相互作用”的一个侧面。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现象，带有偶然性。要想超出合理的范围改变这一现象的发展模式，从科学上是徒然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一些常用的重要范畴，比如在征服国和所谓的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区分，“第二次殖民占领”，殖民化或者殖民管理的类型，民族主义运动，虽然使用起来很方便，但不能过分地使用这些范畴来进行解释和阐述。

另外，殖民时期从其历史性来理解，还有其它的发展过程值得注意，这些过程也有其历史性，军事占领，政治镇压，“教化传教”，福音书传教或者经济发展并不能抵消这一历史性。比如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些土著社会团体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尽可能从好的方面，根据一些战略或者一些道德标准经历了殖民时期，而这些战略和道德标准不能简单地简化为新的秩序，象爪哇“普里亚依”（*priyayi*）穿袍贵族一样。也包括一些虽然被纳入殖民国家，但在殖民国家继续其发展的行会或者政党，比如上沃尔塔的墨西（*Mossi en Haute-Volta*），乌干达的布干达（*Buganda en Ouganda*），拉吉（*Raj*）的君主国，处于保护国状态的君主政体国家，以及很多家族社会，这些家族社会虽然从形式上显得更加慎重，但实质内容却是一样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发展轨迹，比如文化或者宗教运动，伦理标准和风格，保持了自己的自主性的政治思想，比如基督教思想和伊斯兰教思想，泛非主义思想，国际共产主义的思想，共济会，一些服装模式或者舞蹈形式。最后还有其他帝国的发展轨迹，有欧洲的，也有欧洲之外的其它帝国，民族和工业帝国主义与其它形式的帝国共存或者与其竞争。

我们现在想着重强调的，是这最后一种发展的轨迹，也就是帝国之间的影响。十九世纪欧洲的殖民主义并不是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一种经验。一方面，殖民帝国不得不与此前帝国的影响妥协——比如北非和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奥斯曼帝国的

影响——，是在跨国的历史范畴之内，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妥协的。殖民帝国有时候甚至于选择了“第二帝国”的方案，并促使其扩张，希望使它成为一种工具。比如英国在印度洋与阿曼（Oman）的关系就是这样处理的，法国在西非与萨莫利（Samory）的关系也是这样。各种形式的帝国在一些具体地区的共同存在常常是持久的，正如南西·洛丝·汉特（Nancy Rose Hunt）在谈到比利时人和阿拉伯人在刚果东部的重叠和合作时所批出的那样。另一方面，欧洲的殖民主义在每个殖民帝国以及在各个殖民帝国之间都编织了很多“殖民帝国的关系网”，不管从各政府间或者从多边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跨国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种政治经验。

除了其自身比较性的利益之外，对殖民帝国的妥协方式的考虑还有一种好处，那就是可以画出一张特定形势下更加完整的殖民遗产图，更好地理解与全球化有关的联系和积淀效果，理解“后殖民”时期的两重性。人们的记忆因此而被搅乱了。在阿拉伯国家，人们经常比较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和西方的统治。在喀麦隆或者多哥，德国的殖民统治是用来批评法国殖民统治的一个神话。南部非洲的历史仍然带有东印度荷兰公司（Voc）的影响和英国殖民统治影响之间的冲突所打上的烙印。英国和波尔人（boers）之间的战争，英国人、阿非利坎人和非洲土著人之间的三角冲突因高鲁莱德人的出现而显得列加复杂，而且人种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明显，最终成为种族隔离。所有这一切都是两个帝国时代互相妥协所产生的悲惨结局，一个是持有特许权的公司时代，一个是殖民主义的时代。但是，这一结局也产生于行政管理和不同的农业管理的逻辑之间相互作用。但是这种冲突并不一定与阿非利坎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对立相符合，因为很多英国人从卡普殖民地（la colonie du Cap），后来又从纳达尔殖民地（Natal）作为移殖民而定居了下来。

另外，除了欧洲殖民帝国之外，其它殖民帝国的经验影响也间接推动了与西方与工业现代化，与“发展”的关系。因此，欧洲思想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被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精英、语言所阻碍。在这方面，奥斯曼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的精英和语言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与埃及的影响或者人们在很长时间里曾经强调过的在传教士的学校里爱过教育的黎巴嫩基督徒的影响是一样的。虽然利用阿拉伯语的词源或者新派生词来表达一些新的政治、经济或者其它领域的新概念的作法也属于这种对奥斯曼影响的回归。传统的殖民帝国另外还留下了一些关于繁荣，正义，自由，管理，权力，国家，甚至是关于文明的概念，殖民统治远没有彻底消除这些观念。

殖民帝国霸权的相互作用

“传统”帝国或者殖民帝国的建设过程都是不一样的，它们在空间上扩张，以合作和镇压为基础，并从各种程度上重视文化的多样性，并通过“市政参与”（municipalisation），通过承认“蛮子贵族”，也就是“其他人的贵族”，通过“间接规则”来实现地方的自主，甚至于，我们已经看到，可以把优势承包给“次要的帝国”或是作为市场承包给附属国。另外，殖民帝国是一些跨文化的经验，后来又是跨民族的外向发展的经验，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一些范畴的民众，也包括一些政治上占优势的精英阶层，可以通过对方的语言、信仰、价值观或者风格来生存。征服者的帝国，或者甚至是被征服者的帝国，比如经过希腊文化作为媒介的古罗马帝国：帝国的精英，或者至少是精英中的很大一部分，有时是罗马人，而且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有时又是希腊人，而且受古罗马的文化影响。因为罗马公民和担任公职的人可以受双重的文化和语言影响，而这两种语言和文化是互相兼容的。普鲁塔克（Plutarque）是希腊人，也是古罗马公民，他的多重归属很能够说明帝国向外扩张的两重性。这两者之间是可以部分地互

相解释的，帝国时期也曾是人员大量流动的时期，包括从事战争的人员，劳工，移殖民，为宗主国所吸引的属民，或者是为了行政管理或者商务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流动的人员，以及造就并传播帝国霸权观念的第三方语言的文化中间人。

从所有这些观点来看，欧洲殖民帝国也不例外，国际贸易，外国在工业或者种植园的直接投资，大学教育，基督教的传教，伊斯兰教社团以及朝圣从一开始便使各方的关系成了多边的和跨民族的关系。只这些活动便形成了一种组合，有争夺，有经济竞争，但同时又有合作和知识或者模式的交流，其形式是真正的“泛殖民主义”的形式，思考的是一种“比较的殖民政治”，尤其是1894年在弗朗索瓦·约瑟夫·夏耶-贝尔（François Joseph Chailley-Bert）的倡导之下，在布鲁塞尔成立的国际殖民研究所的框架之内进行的思考。

于是有人针对这样的政治派别，针对“把（它们的）意义世界看成都市的一个整体”（科纳留斯·卡斯托利亚迪斯/ Cornelius Castoriadis）的说法而提出了问题，尽管这些政治派别从文化上是向外扩张的，其领土是分散的。经济上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最初的回答，规模越来越大的贸易全球化很快便使这一回答的意义变成了相对的。强制权力提供了另一个答案，但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军事资源虽然在征服时期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但是要想保住帝国的完整，只有军事资源一向是不够的，而且有时候还是少得可怜的。从很大程度上说，只有保持帝国的合法性，才会有帝国的完整性。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帝国是一种“统治”（*Herrschaft*）能够导致人的服从和拥护，这与建立在恐惧基础之上的“强权”体制（*Macht*）是一样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征服时的“强权”制度重新组合成具有“伦理”、“教化”、“福音驯服”或者“吸收”愿望的“统治”制度的过程。当然，由于金融、人口、政治或者简单的种族的原因，这种重新组合的过程显然注定会进入死胡同，不断地采用最为粗暴的强权来解决问题。

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理解“霸权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相互作用保证帝国在分散当中的统一和复制。比如塞尔日·格鲁辛斯基（S. Gruzinski）在对天主教专制政体的研究当中，把亚历士多德的哲学看成是伊比利亚帝国的“软件”。当地的伊比利亚帝国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一个密闭的范畴，而作为其中心的内核就是思想工具，古罗马的正统思想，思想表达的系统 and 编码”，在其它的领域，比如艺术和福音传教领域，所产生的大量交叉却无法进入这一空间。古罗马帝国的“佩戴亚”（*paideia*），爪哇的“塔巴”（*tapa*），以赞成阿拉菲的法学，实行“伊斯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和使用奥斯曼语言为主要基础的奥斯曼风格都是这样的帝国的第三语言。

另外关于这些霸权观念在实际上的“封闭性”问题，还有一点需要讨论。或者这些观念是完全封闭的，那就无法再说什么与之“相互作用”，哪怕是“霸权”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经过思考，这究竟是不大可能的。比如我们以奥斯曼帝国的情况为例，莉莉·佩斯（Leslie Peirce）研究了昂塔布（也就是今天的加济安泰普）在被征服之后不久的城市法庭在一年时间里（1540年-1541年）的工作状况，在研究后指出，事实上，帝国行政管理法“卡努恩”的执行，是中央权力和外省之间进行对话的一个主要空间，尤其是通过“夏里亚”所要求的证据，并由此而在当局和当地民众之间进行了多次谈判或调整。或者相互作用的余地，哪怕是在强权的剑逼迫之下的相互作用，而且所谓霸权，所指的不就是这样吗？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放弃“核心”或者“软件”的思想，至少要放弃认为这个核心或者软件密不透风的思想。

从这个角度来看，殖民帝国又怎么样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化”的使命，或者类似的“伦理”使命，“存在于社会”之上的物质和象征的观念，基督教，进步和发展的思想都曾有助于把这些帝国看成是一个整体，更何况这些思想在土著的“好政府”或者“光明”的观

念当中也有回应，比如在一些伊斯兰社会或者在约鲁巴地方（pays yoruba）。在殖民相遇的时候，在统治别人的技术和形成自我的技术的接合点上，的确是有过“帝国主体形成”的，这是愿望、激情、忠诚、信仰、卫生、性、利益、幻想的问题，因此也就是冲突和痛苦的问题。谢克·哈米都·卡纳（Cheikh Hamidou Kane）在《模糊冒险》（*l'Aventure ambiguë*）中描写过这种“不是两个人时的惶惑”，古罗马帝国时的希腊人大概便已经有这种“既被人统治，又统治别人”的体会了，负责联系殖民国家或者社会机构和殖民地社会的精英，比如在法国的殖民帝国中，塞内加尔“四个市镇”的“进步人”和公民，或者维廉·蓬蒂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颇能让人想起取得了“佩戴亚”身份的人。正如我们简单阐述的那样，这些人在民族主义动员和刚刚独立之后，对帝国遗产的复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象塞内加尔的桑果（Senghor），肯尼亚的恩炯约（Njonjo），马拉维的本达（Banda），津巴布韦的姆加伯（Mugabe）之类的人，哪怕是他们的着装方式，也象征着殖民时期所产生和选择的这个社会阶层的强大的生命力。然而，他们只是冰山可以看得见的一角。同时，帝国中还有很多“相互作用”的力量，民族主义，独立的宗教运动，文化创新的创造性实践，比如在音乐或者服装领域，都是这种相互作用的众所周知的表现，其意义常常被人忽略了。这些相互的作用不是相对于标准而出现的偏差，不是没有能力理解标准，不是对法律和秩序的腐蚀，而是殖民时期的习惯，是对殖民时期的分享和占有。

然而，霸权这个概念好象是与十九世纪和十二世纪殖民经验所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种族化以及对土著社会控制的客观限制相矛盾的。印度的某些“次要研究者”在谈到英国的拉吉时，便提到“无霸权的统治”。历史学家约翰·伊利夫（John Iliffe）在最新出版的作品中开辟了一条关于非洲的值得关注的线索：殖民化破坏或者打碎了正在形成的关于荣誉的概念，并用三种很有争议的道德观念代替了这种概念，一个是团队的概念（*ethos du régiment*），基督教责任的观念和工人阶级的观念。民族主义的成就恰恰来自于从军事、政治和伦理上被占领的社会上的荣誉观念的恢复，以及对“尊严”的吁求。

然而，“殖民遗产”在当代治理形式当中的规模还是告诉我们，不能缩小有可能通过非殖民化的冲突再现殖民霸权的假设。民族-国家在帝国边界问题上对领土框架的维护和经常会十分激烈的保卫行动，民族归属感的强烈程度以及对这种归属感的接受，在殖民时期结成了所谓“至关重要”的特殊身份的顽强生命力，政治阶层和社会团体在宗教和社团领域所接受的官僚机构，殖民主体化观念在物质文化以及相关的技术这一双重层面上的持久影响都证明了这一点。总之，殖民统治导致产生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的“人的各种类型”（*Menschen-tum*），当代的一些行为者仍然以这些类型来识别自己，必要时以民族主义的观点为标准，但也可以以其它的第三方语言为标准，比如经济的，政治的，或者宗教的，比如“改革”的语言，“良好治理”的语言，“繁荣的语言”（五旬节派的繁荣或者伊斯兰的繁荣），“公民社会”的语言，并通过属于全球化的多种技术。激进派，比如伊斯兰的激进派或者土著运动的激进主义，并没有象我们假设的那样与这些观念彻底决裂。正是从回归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的角度来说，冲突是一种占有的程序，而不仅仅是排斥的程序。

如果殖民霸权在当代再现的假设是真的，那么这种假设便能够从一个不同的方面烛照“殖民遗产”。一方面，所谓的殖民遗产处在霸权和宗主国本身公民性的定义中心地位，所以法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争论才会如此激烈。另一方面，殖民遗产在组成后殖民国家的社会关系当中，而不是仅与后殖民国家与其原宗主国或者西方世界有联系。这样一来，我们便能够更好地理解合作、发展援助、“结构调整”，“世界治理”的问题为什么，从怎么样成为一个霸

权链，或者说是霸权联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个霸权链或者霸权联系是作为一种“事件”来看待的，而不是一种基本的“后殖民特性”。这是一种摆脱殖民统治的方式，又不至于影响到原来的殖民地在国际资本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在冷战背景之下的外交忠诚。这些问题有助于为后殖民主义的“被动革命”所依赖的选择提供资源，有助于识别新的“别人的贵族”，有助于“发展掮客”的出现，而从农村到国家的形成，从农村到国家的联系结构正是由于有了越来越多的项目、计划和非政府组织，由“发展掮客”决定的。这些问题通过政府机关和“公私合作”，尤其是通过以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名义恢复特许经营的原则，创新了“间接的行政管理”，通过推行“和平维持”（*peace-keeping*），“良好的治理”，“透明”，“责任”，“公民社会”的观念，把“和平”，“教化”，“伦理主义”再一次变成现实的话语。这些问题延长了干预和条件的实践，西方大国正是通过这样的实践，使奥斯曼帝国，把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的巴尔干和阿拉伯领土，或者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把波斯，中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而人们对这一保护的结果，却有着很多的争议。这些问题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帝国及其外省之间的第三方的语言打下了基础，这种语言成了论说和物质领域大规模“霸权影响”的一种形式。这些问题借助“反对贫穷”的联合国千年目标，使市场有了一种骗人的社会意义，使新自由主义戴上了一张人的假面具，至少在象征和论说的意义上是这样，因为我们并不能保证资金真正从北向南转移。

总而言之，“殖民遗产”在当代的“治理”当中，远远不只是“记忆”的问题，虽然人们很愿意从这个方向去看待“殖民遗产”的问题。“殖民遗产”确定了政治社会的深层结构，包括“北部”的社会，也包括“南部”的社会。“殖民遗产”从很大程度上确定了发展援助的公共政策，而发展援助的公共政策不仅仅是国际关系范畴内的事，也是，而且尤其是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国家内部政治经济范畴里的事。乌弗埃特关于“法国非洲”的古老说法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幸的是，人们出于论战的需要，歪曲了这种说法的意思，使这种说法成了道德诅咒。这里所涉及到的，只是历史社会学的事：当代的全球化是殖民统治的产物，但我们又不能满足于这种简单的“后殖民”的结论。思考“世界的治理”，就是根据每一种实际的形势，思考世界的治理与其帝国主义根源的复杂而又偶然的关系。

让-弗朗索瓦·贝亚，罗曼·贝尔特朗

让-弗朗索瓦·贝亚（Jean-François Bayart, bayart@ceri-sciences-po.org）是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员（政治科学院国际研究中心/ Ceri-Sciences Po），他的主要作品有《世界的治理》（*le Gouvernement du monde*），《对全球化的政治批评》（*Une critique politique de la globalisation*），巴黎，法雅出版社，2004年出版，《身份的幻觉》（*l'Illusion identitaire*），巴黎，法雅出版社，1996年出版以及《非洲的国家，肚子的政治》（*l'État en Afrique. La politique du ventre*），巴黎，法雅出版社，1989年出版，刚刚再版，作者为再版写了前言。罗曼·贝尔特朗（Romain Bertrand, bertrand@ceri-sciences-po.org）是“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FNSP）的研究员（政治科学院国际研究中心/ Ceri-Sciences Po），刚刚出版了《帝国的记忆》（*Mémoires d'empire*），《围绕“殖民事实”的争议》，巴黎，Éd. du Croquant/Savoir-Agir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篇文章是在国际研究中心的研讨班“政治轨迹：国家，民族，帝国”和政治社会分析基金的“殖民遗产和当代治理”研究计划的框架之内共同思考的结果。本文作者尤其感谢托尔尼克·科达兹（Thornike Gordadze），贝阿特里丝·伊布（Béatrice Hibou），弗朗索瓦斯·孟根（Françoise Mengin），他们参与了“殖民遗产和当代治理”的研究计划，也感谢法国发展署对我们的支持，感谢与我们有过交流的法国，土耳其，塞内加尔，英国，新西兰，德国，意大利，墨西哥和美国的历史和人类学的同事们。

Revue des revues, sélection de juillet 2007

Jean-François BAYARD et Romain BERTRAND : « De quel "legs colonial" parle-t-on ? »
article publié initialement dans *Esprit*, décembre 2006.

Traducteurs :

Anglais : Annie Thomas et Aruna Popuri

Arabe : Selmane Ayache

Chinois : Yan Suwei

Espagnol : Arturo Vázquez Barrón

Russe : Ekaterina Beliavina

Droits :

© Jean-François Bayard, Romain Bertrand et *Esprit* pour la version française

© Annie Thomas - Aruna Popuri /CEDUST de New Delhi

© Selmane Ayache/Bureau du Livre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Algérie pour la version arabe

© Yan Suwei/Centre culturel français de Pékin pour la version chinoise

© Arturo Vázquez Barrón/Institut français d'Amérique latine pour la version espagnole

© Ekaterina Belavina /Centre culturel français de Moscou pour la version russe